

当今《诗经》研究之困境 与心理学的思考

张 敏 申荷永

[提 要] 当今《诗经》研究面临的困境有《诗经》文本的不确定性、历史文献与“地下证据”难以取舍、《诗经》中诗歌的起源观点的不统一以及《诗经》研究能否达到客观性等疑惑。国外研究者采用认知诗学等方法论对《荷马史诗》进行的研究，有深远的借鉴意义，而从心理的客观性的视角来进行研究，可成为《诗经》研究的新思路。

[关键词] 《诗经》 研究困境 《荷马史诗》 认知诗学 心理的客观性

[中图分类号] B222 - 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114X (2010) 01 - 0080 - 06

任何研究《诗经》的尝试都会遭遇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诗经》的文本仅 3 万余字，但围绕这 3 万多字所建构的知识体系，已汇聚了近 3000 年的历史。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文本，而是由人类智力组成的海洋。当代研究者对于《诗经》研究的热情和兴趣，已大大超过以往各个时代。与传统的经学研究者相比，当代的《诗经》研究者拥有更为丰富的信息资源，更多样化的研究方法论，但他们面临的问题和困境，依然存在。本文尝试对当今《诗经》研究的困境逐一分析，对国外研究《荷马史诗》的新范式进行介绍，并提出《诗经》研究的心理客观性这一新的思路。

一、《诗经》文本的不确定性

《诗经》文本的不确定性体现在版本、视觉符号、声音符号以及文本内容这四个方面。

第一，版本的不确定性。版本是指各历史时期传播的《诗经》文本，这些文本经历了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自“六诗”版本成形到今天我们读到的《毛诗》版本，文本载体历经甲骨、铜器、竹简、帛书和纸质的变迁。从纸上文献记载来看，有西周的“六诗”、春秋的“诗”或“诗三百”，之后有汉代“四家诗”、留存至今的《毛诗》等版本。从考古发现的“地下新材料”来看，有战国时期的竹书《孔子诗论》等，它提及多篇当今《诗经》版本中的篇目，但也多有异文，如“樛木”为“棣木”等，且论诗的顺序为“颂雅风”，“国风”名为“邦风”；1977 年

出土的安徽阜阳双古堆汉简版《诗经》不属于四家诗，很可能是未被《汉志》著录而遗于民间的另一家^①；另有郭店楚简、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卷中的《五行》“引诗”等，都为各版本的存在提供了证据。

第二，视觉符号的不确定性。作为客观存在的视觉符号独立于研究主体之外，它所指的是纸质书上印刷的、帛书上书写的，或竹简和石头、铜器、甲骨上雕刻的符号。它本身不具任何与文字相关的意义，只存在符号构成上的差别。《诗经》文本的不确定性一定程度上是由这些视觉符号客观上的差异所造成的。例如，《五行》引《关雎》一诗，20个视觉符号当中，有14个与今本《毛诗》大相径庭。作为主观存在的视觉符号更为复杂，根据观察主体的不同而不同。对于古文字专家和《诗经》研究者而言，许多普通读者不能识别的视觉符号都是有意义的，且能读出其发音，但依然存在部分不能释读的，或在意义上有分歧的视觉符号。同一个视觉符号，如竹简、帛书中难以释读的符号，会导致专家和研究者形成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视觉符号，却有可能被理解为属于同一个意义。视觉符号客观上的不确定性导致训诂学难度重重；而视觉符号主观上的不确定性，导致各研究者之间难以统一观点。

第三，声音符号的不确定性。每个时代的研究者都以属于自己时代的语音来诵读《诗经》文本，读音因方言不同而迥异，时至今日，古音已难追寻。在探讨有韵还是无韵的问题时，读音标准难以统一。与视觉文本一样，声音文本首先是一种客体，其载体是人类的发声器官和演奏乐器。它与视觉符号不同的特点在于：它是瞬息消散的。视觉符号因固定可以长期保存，虽错过，可复查；而声音符号转瞬消散，在历史长河中，错过了，难再听。声音文本还有一种主观的存在，也就是听众对声音符号做出的主观反应。我们不仅能把某些声音信息识别为语言，还能对它们产生理解，生成意义，这是人类能相互沟通的条件。从沟通理解的角度来看，《诗经》中诗篇的声音文本和视觉文本，在内容上应当一致，它们所生成的意义是一样的；但从主观体验的角度来看，同一诗篇的声音文本因听众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美学体验和感受。

第四，文本内容的不确定性。《诗经》文本的内容应当是客观的，这种客观性首先体现在：（一）诗歌创作者最初创造诗歌时想要表达的意义；（二）身处诗歌被创作的时代的听众/读者所理解的意义。但是，这些业经创作、读者或听众接受的诗歌，还受到第三个因素的制约：必须经过诗歌传诵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过滤。只有将这三个因素包含在内的共同的语境，即创作者大脑中保存的心理词典、听众或读者大脑中的心理词典、社会意识形态中流通的语言保持一致时，《诗经》文本才具有真正的客观性。但是，每一个研究者阅读《诗经》文本时，都立刻把印在纸质载体之上的某一符号，体验为自己熟悉的字，能够读出其读音，对于诸如“鱼”、“桃”等具体名词，还有可能产生与实际物体有关的心理意象；而对于那些不太熟悉的词，如“茱萸”、“靡盬”等词，则需要借助前人或其他研究者的训诂和理解，投入一定的认知努力，才能认识并了解其读音。这一文本阅读的过程本身就包含研究者自身的主观体验，研究者还会投射自己的主观情感。人们对《诗经》的理解，从孔子时的“思无邪”，到汉时的“圣”，到宋时的“淫”，再到今日讴歌“爱情的美好”，无不反映着研究者的主观情感。建立在研究者主观体验上的文本内容，再经历其主观情感的投射，是否能真正体现客观的文本内容，值得商榷。

二、如何对待历史文献与“地下证据”

传统的《诗经》研究者奉历史文献为经典，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实证考据学。经历了20世纪

40年代的“古史辨”思潮后,当代《诗经》研究者对于历史文献的证据,只能持半信半疑的态度,在援引时缺了几分理直气壮。如傅斯年指出,“凡《左传》、《国语》和《毛义》相合者,置之,怕得是他们中间有狼狽作用,是西汉末治古文学者所加所改的;……我们读古书之难,难在真假混着,真书中有假材料”^②。

脱离了历史文献的根基,本来错综复杂的《诗经》研究,更加丧失了将其维系在一起的纽带。而新的方法论在一次又一次的尝试当中,带来了“得”,也带来了新一轮的“失”。也许能稍稍解决《诗经》复杂局面的,是“地下证据”的出现。如阜阳双古堆汉简内容包括今本《国风》中的《周南》、《召南》、《邶》、《鄘》、《卫》、《郑》、《齐》、《魏》、《唐》、《秦》、《陈》、《曹》、《豳》等。《小雅》有《鹿鸣》、《四牡》、《常棣》、《伐木》。整理者将简本《诗经》与《毛诗》作比较,将其异文分为四类:(一)音义相同或相近的异文;(二)音义不同的异文;(三)虚词的异文;(四)今本《毛诗》或简本的错字造成的异文^③。也有研究者从不同载体如“金石简帛”的《诗经》异文入手进行研究^④。但早于《毛诗》的《诗经》版本是否更权威,是否应当取代《毛诗》版本;训诂学的对象以之前的竹简版本为准,还是以《毛诗》为准,都是面临的难题。如研究者多根据惠周惕《诗说》将“颂”训为“容”,即表演的意思,而上海博物馆楚简《孔子诗论》上的“颂”字为“訟”字,即可推翻这一观点。有研究者根据“诗”字的构词法来推断“诗”的来源;但郭店楚墓竹简中,“诗”字有多种写法,《小雅》的“雅”字和《大雅》的“雅”字,写法也不同今本^⑤,根据何种写法进行训读也是难点。

三、关于《诗经》中诗歌的起源观点的不统一

关于《诗经》中诗歌的起源,主要有“周诗说”和“原始诗歌说”两类。

第一,“周诗说”及其疑点。国内多数《诗经》研究者坚持“周诗说”,即把西周时“六诗”的成形规定为《诗经》系统时间纵轴的上限。如傅斯年认为,“‘诗三百’之时代一部分在西周之下半,一部分在春秋之初期中期,这话至少目前可以如此假定”^⑥。坚持“周诗说”,似乎以这一假设为基础:没有书面文字,口头创作的诗歌无法保存。因此,所有创作于周代之前的诗歌无一幸存。在这一假设的基础上,再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可以构建出这样一个发展体系:《周颂》无韵,所以最早;《大雅》、《小雅》继之,《风》的创作风格最成熟,所以创作时间稍后。这样的发展体系在“西周到春秋中期”这一独立的时空范围内,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建立在与属于“口语传统”的诗歌的传播链完全割裂的基础上,因而呈现出许多困扰《诗经》研究者的地方:首先,那些超越历史记载的诗篇创作者的生存空间无法确定;他们所创作的诗作如何进入“六诗”当中,也无法得知,最初构成“六诗”的是哪些诗篇,无法确定。其次,由“无韵”到“有韵”这一发展方向,不仅与全世界范围内各文化中由“诗”到“散文”的发展顺序不相符,也与《尚书》等古典文献的记载不相符。《虞书·尧典》中记载的“诗言志,歌永言”,已经是相当成熟的对“诗”做出的概念说明;《弹歌》这首早于尧、舜时代的原始歌谣,带有浓厚的韵律,足以作为“《周颂》无韵,所以最早”的反证。甚至连最激烈的疑古学派代表人傅斯年也提出了自己的困惑“最不容易受政治大变动而消失或散乱者,是《国风》;最容易受政治大变动而消失或散乱者,是《颂》。……《周书》、《周诗》现在的样子好不奇怪!”^⑦

第二,“原始诗歌说”及其困惑。中国古代《诗经》研究者也提出“诗”的最早时间应始于原始人类时期,如:郑玄《诗谱序》:“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宋代的黄木熏在《说诗

总论》中也提出“自有天地有万物，而诗之理已具。……康衢顺则之谣，元首股肱之歌，皆诗也。”认为诗的起源早于文字，而《国风》具有原始诗的特点的现代研究者有朱光潜。他指出：“从历史与考古学的证据看，在各国诗歌都比散文起来较早。原始人类凡遇值得留传的人物事迹或学问经验，都用诗的形式记载出来。”^⑧而将“原始诗歌说”推到了极致的则是闻一多的《诗经的性欲观》：“风便是性欲的冲动。……可见当时的人类，至少在性欲上，是和下等动物差不多一样的没有节制”^⑨。“原始诗歌说”符合世界文化中由“诗”到“书”的发展顺序，也符合《尚书·尧典》中“诗”的起源早于“尧舜时代”的说法。“原始诗歌说”对“周诗说”带来的冲击是：（一）《国风》中部分诗篇的创作者是“在性欲上和下等动物差不多一样没有节制”的原始人类；（二）诗的形式与原始人类的记忆有关。这与“周颂无韵，所以最早；风的创作形式最为成熟，所以最晚”这一符合历史记载的推断，顺序完全不同。但是，《诗经》中诗歌的形式与记忆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研究者进行深入探讨。

四、《诗经》研究能否达到客观性

两千多年来人们研究《诗经》，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理解《诗经》的文本，达到最接近诗人表达的内容的本质吗？在我们批评每一个研究者的观点和判断主观的同时，我们知不知道什么又是《诗经》研究的客观性？从《诗经》的版本来说，哪一个版本最接近《诗经》文本的客观性？是“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的“六诗”版本，是季札观乐时听到的《周南》、……《唐》、《陈》、《桧》、《小雅》、《大雅》、《颂》，是孔子读到的“诗三百”，还是我们今天能读到的《毛诗》？从《诗经》文本的视觉符号来说，最客观的是镌刻在甲骨或铜器上的西周文字，是战国竹简上的简文，是西汉帛书上的符号，还是今天纸质载体上的符号？从《诗经》文本的声音符号来说，最客观的是“在周之庭”表演的“瞽矇”的诵唱，还是“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时的演奏^⑩？从《诗经》文本的内容来说，最客观的理解，是诗歌创作者最初创造诗歌时想要表达的意义，还是诗歌被创作的那个时代听众/读者所理解的意义，还是诗歌被创作的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所能接受的意义？

两千多年来积累的训诂和考证的材料，已经成为我们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对于今天理解《诗经》文本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正如当代《诗经》研究者已经看到的，对古人如同“毛矿”的训释材料，需要进行比较鉴别，进行科学的辩证，去伪存真^⑪。对今天采用各种研究方法而形成的新的训诂体系，我们也需要进行鉴别，不能随意采用。我们还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认为某些注疏和理解是合理的，而某些结论又是荒唐可笑的？这涉及《诗经》研究者很少涉足的一个领域：在主体对视觉符号做出主观反应的同时，其大脑内部各结构之间所发生的内在心理过程。我们认为一种注疏合理，是因为做出注疏的研究者的内在心理加工过程，与作为现时读者的我们的内在心理加工过程存在相似的地方。因此，对训诂学积累的知识进行鉴别时，真正科学辩证的方法，不是由单个研究者所规定的，而应建立在对语言产生、理解和传承过程中涉及的重要成分——大脑及其心理过程研究的基础之上。

五、国外《荷马史诗》研究新范式的借鉴

《荷马史诗》是古希腊诗歌的最早起源，目前国外研究者研究《荷马史诗》的新范式主要是结合帕利-劳德理论和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关注口语传统与人类大脑记忆的关系，这为我们研

究《诗经》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研究范式。认知心理学家鲁宾（David C. Rubin）将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与口语传统相结合，从口语传统传播稳定性的角度，以《荷马史诗》、摇篮曲和数数韵为分析文本，探究了记忆制约条件与口语传统中呈现的主题、意象、声音特征之间的关系。论述口语传统的传播和保存时，鲁宾采用了一个达尔文进化论的隐喻：如果一种传统（物种）要存活下来，它必须能够成功地被传播（复制）。环境的改变会改变（选择）该传统的部分特征。然而，如果这些传统的改变太过激烈，就根本不能被传播，就会导致消亡^⑫。闵钦（Minchin）把荷马学者关于《荷马史诗》的研究（特别是帕利—劳德的套语理论）与认知心理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通过对文本进行分析，探讨其中与记忆有关的策略资源。闵钦认为《荷马史诗》是完全不依赖书面文字的帮助而创作的口语传统，她指出^⑬，荷马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保存在自己的记忆储存库当中，并在表演时利用自己的记忆资源。因此，口头诗歌的表演基本上就是记忆的艺术。记忆资源来源于情境记忆、听觉记忆、视觉记忆和空间记忆。这些记忆功能比帕利—劳德提出的言语的记忆（套语）更具优势。上面两位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可以称为“认知诗学”（Cognitive Poetics），它是一种学科多元化的研究方法，采用由认知科学所提供的工具来对文学作品进行研究。认知诗学这一概念最早由彻尔（Reuven Tsur）提出，它是一种尝试，来确定“诗的语言和形式，是由人类的信息加工所制约和塑造的”^⑭。

与《荷马史诗》这样的鸿篇巨著被西方研究者认为是纯粹的口语传统（没有书面文字的帮助）^⑮相比，国内研究者过分夸大了书面文字在诗歌传播中的作用，事实上，据《周礼·春官》记载，“六诗”的主要诵唱者，是无法看到文字文本的瞽矇。王靖献曾采用帕利—劳德理论，通过对《诗经》文本进行系统观察和统计，证实了《诗经》文本中“套语”的存在，这为从口语传统的角度研究《诗经》提供了数据上的支持^⑯。《诗经》中诗篇的形成与传诵的概貌，也需要在口语传统的传承与变迁直至书面文字的影响的范围内，进行重新勾勒。

六、心理的客观性：《诗经》研究的新思路

就我们现在能在书店买到的纸质《诗经》文本而言，它应当有两个层面的客观性。

第一，从视觉符号来看，真正的客观现实应当是构成一首诗的由油墨等物质的化学分子构成的视觉符号，它们存在于大脑之外的外部世界。我们的大脑会对外部世界的物质特征进行加工，进而产生关于“文字”的主观体验，这是经过大脑编码的版本，并不是客观现实本身，但我们将对现实的心理表征与现实混为一谈^⑰。对《诗经》文本中视觉符号的阅读，不可避免地涉及主观体验，无法做到客观。研究《诗经》文字，不能如自然科学一样在显微镜下观察视觉符号的特征，或如考古学一样用碳同位素测量载有文字的甲骨产生的年代。一旦要对“甲骨文”进行释读，要对《诗经》文字进行研究，就必须有研究主体的主观经验的参与。在不识字的人眼里，这些符号只有形状上的差别，没有意义上的差别。但在《诗经》研究者的眼里，它们具有非常丰富的涵义。这涉及第二个层面的客观性：这些符号在人类的心理词典中，应当具有客观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⑱：首先，字词拥有字形信息，即通常意义上的书写规则。其次，字词拥有语音信息，用以规范使用口语时的语音加工。再次，心理词典中还存储了有关字词的语法信息，它规范了字词与其他字词的关系。最后，字词在心理词典中还包括构词信息，如“之子于归”、“之子于归”等套语，都包含了我们对于词语语义结构的了解。除此之外，心理词典中存储的信息还包括我们对于语言及其所描述的现实世界的一些认识，如“葛藟”，是指称一种植物等。就

这些符号在人类的心理词典中存储的信息而言，它们所表征的意义应当是客观的。因此，研究者研究《诗经》探究的正是《诗经》文本的视觉符号在人类心理词典中表征的客观性。而要达到这一客观性，前提条件是诗歌的创作者和《诗经》研究者都拥有相同的心理词典；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有许多构成文字的符号在今天已不能释读，我们无法追寻与诗歌创作者同时代的心理词典，因此，这也是导致《诗经》训诂学难度极大的原因。

第二，就《诗经》文本的组织形式而言，其中的每一首诗，应当只存在符号组合形式的变化，以及视觉符号的不同等差异，对于一个不识文字的人来说，并无难易之分；而在研究者的判断中，会出现简单或复杂的差别、容易理解和难以理解之分；人们会觉得某些诗歌具有如“叠音、双声、押韵、顶真”等“丰富”的艺术特点，而不同的诗表达了不同的涵义，如爱情、性、礼、战争、祭祀等，这些都是我们主观上的体验。我们需要区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一）印刷在纸质载体上的文字符号的组织形式（客观现实）；（二）读者对这些符号做出反应时大脑中所进行的加工；（三）读者看到文字符号时做出的主观反应，如某一首诗是描写爱情，某一首诗是讲述历史，等等。因此，当我们觉得《国风》中的诗比《大雅》中的诗容易理解时，是我们大脑中对于视觉符号及组织形式的加工，导致了主观体验中诗与诗之间的差别。

《诗经》研究的客观性，应当从我们的大脑内部寻找基础，因为“诗”本身是人类大脑的产物，而对“诗”的倾听、阅读和理解，也只有人类的大脑才能完成。将当今心理科学对于人类大脑及心理的研究发现应用在对《诗经》的研究之上，而不是将某个研究者的主观推断视为权威意见，可以体现《诗经》研究的客观性。我们也期待心理学与文学两个领域的研究者能从跨学科的视域进行合作，努力开创《诗经》研究的新局面。

①③李均明：《古代简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90、90页。

②⑥⑦傅斯年：《诗经讲义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5、15页。

④于蒹：《金石简帛诗经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⑤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8、50页。

⑧朱光潜：《诗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5页。

⑨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3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9~170页。

⑩《仪礼·乡饮酒礼》。

⑪夏传才：《思无邪斋诗经论稿》，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年，第201页。

⑫David C. Rubin, *Memory in Oral Traditions: The Cognitive Psychology of Epic, Ballads, and Counting-out Rhym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0.

⑬⑮Elizabeth Minchin, *Homer and the Resources of Mem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01, pp. 1~31.

⑭Reuven Tsur, *Toward a Theory of Cognitive Poetics*,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1992, xiii.

⑯王靖献著，谢谦译：《钟与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⑰Ian Steward and Jack Cohen, *Figments of Reality: The Evolution of the Curious Mind*, 1997, pp. 200~201.

⑱陈烜之：《认知心理学》，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05~306页。

作者简介：张敏，复旦大学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上海 200433；广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副编审。广州 510250 申荷永，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责任编辑 刘慧玲]